

抗战期间蒋介石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述论

陈红民 罗树丽

内容提要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内迁,四川对于抗战大局举足轻重。如何使这个与中央貌合神离的西南大省变为国民政府如臂使指的大后方,系蒋介石面临之难题。刘湘去世后,蒋介石原拟由虽为川人实属中央势力的张群入川主政,遭到四川地方实力派抵制,被迫接受“川人治川”的主张,选择较为忠心且有一定实力的川军将领王缙绪代理四川省主席,但王过于亲蒋的举措又为其他川军将领联名反对。面对复杂的川中势力角逐与抗战的迫切形势,蒋最终决定亲自兼任四川省主席。蒋主政四川一年多,提出了系统建设四川的《施政纲要》,并督促落实禁烟、推行新县制、整理财政、经济建设等政策,对把四川建设成为安定的抗战大后方起到了一定作用,也强化了中央对四川的控制。局势稍稳之后,蒋介石再次安排张群入川主政,其兼理川省主席的生涯也随之结束。此一历史过程,折射出蒋在处理与四川地方实力派较量中的风格与政略,即最终目标上坚持原则,但方法上却较为灵活柔性,甚至妥协退让于一时。

关键词 蒋介石 四川省政府主席 地方实力派 抗日战争

学术界对于1939年至1940年间蒋介石曾一度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这一历史事件,已有一定研究成果,但现有成果多拘于叙述事件经纬,失之简单,评论更有可商榷之处。^①随着蒋介石档案与日记等资料的公开,使得重新审视这一事件成为可能:蒋介石缘何要兼任?其兼理四川期间的政绩如何?如何评价蒋的兼任?

本文拟以蒋介石兼理川政的缘起、经过及后续影响为主线,探讨蒋介石兼理时期的安川、建川

^① 相关的成果,在通论著作方面有,罗伯特·A. 柯白(Robert A. Kapp)著,殷钟嵘、李惟健译:《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杨光彦、匡珊吉:《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论文则主要分布在三方面:1. 蒋介石与四川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如温贤美、马宣伟:《国民政府迁渝前后蒋介石与川康地方实力派的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天府新论》1988年第2期),黎志辉:《川谣·川灾·川政——抗战前夕四川的统一化进程》(《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等;2. 蒋介石确立四川为抗日根据地,如唐润明《试述四川抗日根据地的策定》(《中国重庆抗战陪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文出版社1995年版),潘洵:《论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变——兼论“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和外延》(《西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等;3. 具体针对蒋介石兼理四川的文章,包括陈雁馨《抗战时期蒋介石亲兼四川省主席记略》(《文史杂志》1988年第4期),王正元:《四川省主席蒋介石兼理》(《世纪》2004年第6期),马宣伟:《也谈蒋介石兼理四川省主席》(《世纪》2006年第4期),曾景忠:《抗战期间蒋介石一度兼理川政》(《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这些文章着重于蒋介石兼任四川省主席的始末,但其中大多系通俗读物,具体事件时间和人物关系等也有矛盾及错讹之处。

方针及策略,冀在对此历史事件进行复原的同时,充实与深化蒋介石研究,尤其是蒋与地方实力派关系的研究。

一、蒋介石对四川政局的认识与治川举措

四川位于中国西南腹地,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然而,由于偏居西南,交通不便,加之军阀派系林立,四川长期处于半独立的状态。

蒋介石对四川在全国军事地位重要性的认识始于民国初年,1921年1月他在呈交孙中山的军事意见书中提出:“对于军事准备之意见,四川非导入我势力范围不可。故军事准备,概以粤、蜀相提并列。”^①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对整理四川军政、财政、教育等方面均有规划,期能“树统一之机关,破防区之弊制。”^②然而,当时蒋面临种种困难,对整理川政心有余而力不足。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到1935年间,四川地区大小武装争斗达400次以上,其中“规模较大的战争就达到二十九次”。^③

为安定四川,将其真正纳入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蒋介石派以贺国光为主任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于1934年底入川,协助刘湘“剿共”。参谋团的重要目标,“不外乎将四川政治纳入中央体制,并将川军纳入全国统一指挥编制的军事系统中”。^④1935年2月10日,四川新省府宣告成立,刘湘、邓锡侯、杨森等人相继交出防区,实现四川省政的基本统一,时论认为是开创了四川“新纪元”。^⑤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第一次到四川。他在题为《四川应作复兴民族之根据地》的演讲中,强调四川的重要地位及对四川的期许:

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无论从哪方面讲,条件都很完备,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为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我们既然有了这种优越的凭借,不仅可以使四川建设成为新的模范省,更可以使四川为新的基础来建设新中国。

……

中国自古还有一句话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句话并不是随便说的,其中确含有很大的意义。我提出这句话,也并不是要来责备四川同胞,乃是说明四川对于国家治乱的关系与四川同胞的责任之重要。我们无论从历史的事实来证明,或从四川在全国所处的地位来看,四川的治乱,确可以影响全国的安危。所以要统一国家,完成革命,必须四川同胞先来负起这个责任。如果四川同胞不能负起革命责任来尽力于革命事业,我们整个革命事业,更没有完成之一日。^⑥

蒋介石对四川地理、物产、人文、交通等作了综合考察,意识到要将整理川政、建设四川与未来

①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六编(2),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影印初版,第112—113页。

② 周开庆:《民国四川史事》,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51页。

③ 王恩收:《川军兴衰录》,《档案天地》2010年第4期,第41页。

④ 吕实强:《抗战前蒋中正对四川基地的建设》,《蒋中正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3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6年版,第273页。

⑤ 《社评:四川新省府成立》,天津《大公报》,1935年2月11日,第2版。

⑥ 周开庆:《民国四川史事》,第53—54页。

的抗战结合起来：“只要四川能够安定，长江果能统一，腹地能够建设起来，国家一定不会灭亡，而且一定可以复兴。……就是只剩下我们四川一省，天下大事也还是大有可为。”^①此番讲话固然旨在激励四川民众，但也说明蒋对四川重要地位有了足够认识。1935年11月“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成立，辖区包括川、滇、黔、康各省，力图掌握整个西南政治、经济、军事大权。

全面抗战爆发不久，身兼四川省主席、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等要职的四川实力派代表人物刘湘于1938年1月20日病故。四川各派系都将刘身后留下的空缺当成是扩张实力的契机。刘湘部将潘文华、王缙绪等跃跃欲试，非刘湘部属的刘文辉、邓锡侯等人也不甘示弱。一场中央与四川、四川各将领之间的多方角逐拉开帷幕。

蒋介石闻刘湘死讯，感情复杂，他意识到刘之病故是统一四川的良机：“晚得刘湘病故之报，但从此四川可以统一，抗战基础定矣，未始非国家之福。”^②国民政府于1938年1月22日决议由张群继任四川省主席，撤销刘湘任司令长官的第七战区与川康绥靖公署。^③此时，距刘湘故去仅两天。

刘湘尸骨未寒，蒋介石就匆忙派张群主政四川，其控制四川的迫切意图招致川人怨愤。四川省保安司令王陵基1月25日率先通电反对，“对川省人事有所主张”。^④王陵基是刘湘在陆军速成学校的教官，深得刘信任，自觉有把握填补刘湘的空缺位置。原先矛盾重重的四川实力派均意识到，“各自为战，不如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⑤他们转而密切联络，留川的各师旅团长联名电报表示，“对中央发表张群主川，不表赞同”。^⑥以“武德校友会”为中心的各派势力在成都组织群众游行示威，反对张群入川。

蒋介石得知川省反对风潮，研判“四川反张（群）风潮与其背景”^⑦，感觉不能动硬，随即确定“处理川局须和缓、安定”的方针^⑧，并致电川军各将领说明，以期平息风波：

中央重视川政，固无不筹维悉当，而中正对我全川父老袍泽，及与甫澄（注：刘湘字）主任多年患难相依之关系，于公于私，尤不能使一事一人之不得其所，甫澄之僚友，即中正之僚友，甫澄之部属，即中正之部属，爱护之诚，罔间始终，诸凡措置，必以对国、对川、对逝者、对生者，均无遗憾为前提，一方面使川省对国家克尽伟大之贡献，同时亦必保障，才能登用贤俊，俾成有效率之机体，即机关或有更张，而人员必为安顿，只要服从中央命令，遵守甫澄遗嘱，则绝不令甫澄所部有一人之失所而无所依托也。^⑨

然而，蒋介石并未改变张群入川主政的本意，其安抚措施收效甚微。1月29日，川军留川部队旅长彭焕章等27人联名电呈蒋介石，请收回成命，重新考虑主管四川军民两政的人选，“并通电全

① 《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的关键》，《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3，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471—480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1月20日，原件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下同。

③ 《张群主川发表，刘湘遗体今大殓，国府昨明令褒扬》，汉口《大公报》，1938年1月23日，第2版。

④ 周开庆：《四川与对日抗战》，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127页。

⑤ 黄应乾：《刘湘死后川局波澜记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2—83页。

⑥ 成都市政协文史办公室编辑组：《抗战八年成都纪事》，《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编印，第14页。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1月25日。

⑧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1月28日。

⑨ 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年版，第176—177页。

国,申诉他们的主张”。^① 面对四川将领群起反对,蒋想了些变通方法:首先想到的是以张群为行营主任,“在渝组织省府”,避免张与实力派的直接冲突。^② 第二个想法是派何应钦入川:“川局尚无结果,夜长梦多乎?以缓制急乎?派何应钦入川,何如?”^③之后又想派熟悉四川情形的顾祝同或贺国光接替张群主持川政。

蒋介石与川军将领的分歧在于:蒋希望加强中央对四川的控制,而川军将领以“川人治川”口号抵抗蒋的企图,甚至扬言,“顾祝同如敢飞蓉,当以机枪大炮在机场欢迎。”他们主动出击,将“成都军人以王缙绪任四川省主席,潘文华任川康绥靖副主任的主张”正式通知顾祝同,态度坚决。^④

四川绅耆也就继任省主席事对蒋介石施压。3月13日,四川绅耆方旭、刘咸荣、尹昌龄、张澜等联名电呈蒋介石,对川政应努力途径有所陈述,其要点为:“一、减轻人民负担;二、树立廉洁政治;三、完成中央批准之刘故主席建设计划。”^⑤内含“川人治川”的主张。四川绅耆的建议对蒋产生了一定影响。

蒋介石在碰了不少钉子后,终于改变主意,转而选择较为忠心且有一定实力的川军将领王缙绪代理四川省主席。行政院1938年4月26日公告:“经行政院本日会议议决,由王缙绪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⑥同日,军事委员会任命邓锡侯任川康绥靖主任、潘文华为川康绥靖副主任、刘文辉兼任重庆行营副主任。^⑦主要的川军将领各有所得。

至此,刘湘病故后之川省军政人事问题初步获得解决。这次风波,以蒋介石骤然决定张群任四川省主席开始,以收回成命结束,四川地方实力派是赢家。有学者指出:“蒋中正在处理川省风潮过程中可谓费尽心力,除派员斡旋、电勉慰藉以消弭川军反对意见外,亦运用内部分化、权利平衡及利益拉拢等诸般手段,加以配合舆论及川中父老之压力,终使风潮得以平息,事件和平落幕,总算有个不错的结局。”^⑧

二、蒋介石无奈兼任省主席

王缙绪对蒋介石甚是忠诚,上任后即宣称完全服从中央、服从蒋:“今后中央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只有一个领袖,即如本人亦只知服从蒋委员长,国家前途成败利钝,全由蒋委员长做去。”^⑨王自恃有蒋撑腰,肆意妄为,在多种场合责骂川籍要员,诋毁刘湘,对刘文辉、潘文华等也不放在眼里,对省府人事大加更张,排斥旧人。王的行为,在四川引起普遍不满。耆老张澜素与王缙绪不睦,避居重庆,声称“王非治川之才,应早去之”。^⑩

1939年8月,谢德堪、彭焕章等7位川军师长联名通电,宣布王缙绪“祸川十大罪状”,要求中央尽速撤换,“以平民愤”。^⑪发起“倒王事件”7个师长背后,是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等实力派人

① 成都市政协文史办公室编辑组:《抗战八年成都纪事》,《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15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1月28日。

③ 黄自进、潘光哲编:《困勉记》(下册),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597—598页。

④ 黄应乾:《刘湘死后川局波澜记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82—83页。

⑤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1937年—1950年)》,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年版,第44页。

⑥ 《行政院决议王缙绪代理川省主席》,《申报》,1938年4月27日,影印第356本,第209页。

⑦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1937年—1950年)》,第48页。

⑧ 杨维真:《1938年四川省政府改组风潮始末》,台北《国史馆学术集刊》第4期,第131页。

⑨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1937年—1950年)》,第56页。

⑩ 陈雁肇:《邓汉祥在川康政治舞台上的后期纵横》,《贵州文史天地》1998年第1期,第62页。

⑪ 黄应乾:《刘湘死后川局波澜记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93—94页。

物。一时成都城内谣言四起，混乱不堪。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记述：

四川主席王缙绪缺乏政治能力，与四川军人不睦。近日四川军人一面调其军队暗中包围成都，一面电请中央撤王。今日，蒋先生宴川康观察团参政员，张澜（川参政员）即席请蒋先生迅速撤王。蒋先生已派贺国光、何成濬前往成都处理。^①

8月11日，蒋介石得知7师长反王消息，深感痛愤：

四川军阀又要争夺私利，目无中央，目无外患，悲痛无已。此为内乱内讧，虽为川事，实最严重。上帝佑华，必不使此事表面化，而能化险为夷也。

下午为川阀内讧事深忧切痛，外患至此，尚有军阀如此作恶，愚鲁无识之徒不可以包容为也。^②

四川地方实力派再次联合示威，蒋介石的焦虑与痛苦可想而知，但也无奈地想先平息事端，避免冲突：“对成都王（缙绪）、潘（文华）之争，应先以照理依法直王而曲潘，先令其双方军队撤回原防而后再秉公查办。先注重其中立将领而安顿之。”他在12日派贺国光“回蓉调解冲突”。^③次日，蒋介石即考虑“川事决自兼代”的可能性。^④经过一段思考，蒋确定了“川局从头做起之计划”。^⑤该计划的核心，就是自己兼任省主席。19日，蒋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

最近不如意之事，尤以成都各师长反对王主席最为痛心。惟终能动性忍心，再以逆来顺变之道处之，以求不致溃决则幸矣。^⑥

四川省主席的纷争事关安定后方大局，须尽早解决。王缙绪已成众矢之的，若另选川将中任何人继任，恐怕亦难服众，何况这会助长四川地方实力派对抗中央之气焰，之前的种种努力将前功尽弃。而若选派中央大员出任，又有川康实力派拒绝的前车之鉴。蒋左右为难，只能考虑兼任。

战局的发展容不得蒋介石从容计议。9月16日，蒋得到“倭海军省十四日称其海陆军已充分协作，决将对我不大举进攻，截断我西南、西北国际线”的情报。当天他参加国民参政会，但所思虑的却是川事，认为军人乱政的遗毒不除，“川无宁日矣。”^⑦要断然解决四川省主席问题。3天后的9月19日，国民政府明令：

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缙绪，志切抗战，请纓出川，恳辞主席职务，英勇卫国，殊堪嘉尚，王缙绪应准率部驰赴前方，悉力御侮，在出征期间，所有四川省政府主席职务，着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兼理，此令。^⑧

①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1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132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8月11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8月12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8月13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8月19日。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8月19日，“上星期反省录”。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16日。

⑧ 《川豫两省政府改组，蒋委员长兼川主席》，重庆《大公报》，1939年9月20日，第2版。

这样的处理,既保证蒋对四川局势的控制,又给王缙绪足够的面子。9月21日蒋在日记中表达了对兼任感想:“国际局势万变,不可究诘,敌情变化亦难断定,惟有安定四川,集中人才,全力建设,乃为惟一基本工作,只要基础稳固,则其他皆易运用也。”^①

蒋介石兼理川政消息传出,反应普遍良好,四川各将领均表示“竭诚拥戴”。^②《申报》以“社评”大为赞扬,该报引用“成都来电”报道10月7日蒋到省府视事,乐观地展望未来:“是日天气晴朗,象征川省前途光明无限,人民亦均欢欣鼓舞,悬旗庆祝。”^③

对蒋介石兼任之举,国民党高级干部评价不一。唐纵认为,此乃安定川局一举两得良策,既鼓励川中将士努力抗战,又杜绝省主席一职引发的纷争:

今日委座召唐式遵代表来见,嘱其转告唐总司令,四川省主席现由委座自兼,将来谁作战有功,即交谁主持。一方面鼓励唐抗战,以示留以酬功之议;一方面委座兼任,以杜后方军人覬覦政治之门。别是非,明曲直,无有出其右者。委座此种处置,诚令人赞佩无既也。^④

顾祝同、李济深、王陵基、吴鼎昌等还以蒋介石“不辞辛劳,兼理川政”,向他发电致敬。^⑤

陈布雷则认为,这是蒋“严诫婉劝,均无效果”的无奈之举。^⑥时任军令部部长的徐永昌更指蒋所用的是“下策”：“蒋先生自己决定兼代,乃策之最下者。”^⑦

蒋介石兼任四川省主席后,一度很认真地考虑政务,“专心全力建设四川根据地之方案”。^⑧他于10月3日从重庆飞成都,处理川事。10月7日上午,四川省政府举行新旧交接式,蒋介石正式视事,秘书长贺国光等同时就职。^⑨蒋介石赴蓉主要目的是安抚民心,了解川情概况,以便筹划建设方针。他的行程颇为紧凑,大致包括:1. 主持省务会议,听取各厅长报告本年度施政纲领;2. 对党政干部及川军将领训话,训勉各界人士共同协作、发展四川;3. 约见成都绅耆、教育界人士,征询治川意见;4. 视察成都市的建设。

蒋介石对四川地方实力派采取恩威并施的办法。他到达成都当天即去“视甫臣之墓”。^⑩之后又专程赴新都县祭在抗战中牺牲的川军师长王铭章之墓,“抚慰其遗族”。^⑪但他在抚慰川军将领的同时,不忘震慑,在日记中记道:

抗战期间,军阀如此可谓毫无心肝,其与汪(精卫)奸相差无几矣。兼理川政如期视事,此为基本安危之关键。从此抗战建国之基业,只要能勤慎努力,则大定矣。^⑫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21日。

② 《蒋委员长兼理川政,川省民众欢迎,军政首长纷电拥戴》,重庆《大公报》,1939年9月21日,第2版。

③ 《社评:蒋委员长躬亲川政》,《申报》,1939年10月9日,第2版。

④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⑤ 《蓉电汇志》,重庆《大公报》,1939年10月15日,第3版。

⑥ 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页。

⑦ 徐永昌:《徐永昌日记》(手稿本)第5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89页。

⑧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22日。

⑨ 《川省府昨日交接,蒋兼理主席视事,刘文辉抵蓉谒蒋委员长》,重庆《大公报》,1939年10月8日,第2版。

⑩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10月3日。

⑪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10月15日。

⑫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10月7日,“上星期反省录”。

10月15日,蒋介石于离开成都前以兼理主席身份发表《告四川省同胞书》,令各县广为“布告”。^①蒋在该文告中阐述此行观感与对川省父老昆弟的期望:“第一,愿全省贤达与知识人士,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其二,今日川政要务,厥在休养生息,然修养生息之道,决非姑息苟安,而生息之本,乃在勤劳严肃。其三,为拯救川民,势必厉行禁政,肃清烟毒。此为中正所欲特别申言,而愿我全省军民切实遵行之一事。”^②蒋提出要减轻川民负担,保证“不加田赋”:“今日川民之最能尽瘁公家者,无过于前方兵士与后方农民,此皆国本所托,首宜特予顾恤。故与其贸然减征,不如裕农村之金融,为耕农谋幸福,以安前方士兵之心理。与其于未定确实办法之先,预为减轻课税之诺言,不如宣示决心,向吾同胞提出负责不加田赋之保证。”蒋也表明了整顿吏治的决心:“自必勤求川省之贤俊,担当地方之政事。然必训练以养其才,考核以课其效,亦必明定劝惩黜陟之标准,而行之以至公。其他改革弊害,剿除匪患,更必督飭所司,限期完竣,各以实事求是之心,力屏粉饰迁移之习。”最后,蒋介石表明莅川之目的:“既不欲示惠以沽誉,亦不欲夸言以自欺,更不欲苛责我川省军民以难行之事。惟以平实简易之一片忠诚,期望我川省同胞勤勉奋发,进为现代之国民,而发扬我川省之特长,于以求抗战之胜利与建国之成功。”^③

《大公报》对蒋介石首次莅川主持省政颇为称许:“蒋委员长在蓉,每日皆至省府办公,与各厅长共商整顿省政之策,故省府各级人员均极兴奋,而蔚成一片惕厉精勤之朝气云。”^④蒋介石在成都这几日,适逢前方战事“迭获胜利”,他心情大好地记道:“兼理四川主席以来,诸事亦多顺手,但须知福兮祸所伏,应戒惧勿骄!”^⑤唐纵日记也从侧面印证蒋的感觉良好:“今日委座从成都回来,往晤张主任、王侍卫长、余秘书,谈此次在成都经过情形良好,今后将常往成都处理公务。”^⑥

半年后的1940年4月,蒋介石再次到成都处理川省政务。与上次以安抚人心,了解情况为主不同,蒋此行主要目的是视察川政进展状况、制定四川复兴建设后续计划。蒋的行程主要包括:1. 主持省务会议听取汇报,研究省政府概算,商定《四川省经济建设纲要》;2. 主持禁烟、剿匪、生产建设委员会等各项具体的工作会议;3. 约见川康军政要员;4. 会见成都各界绅耆、学校校长;5. 发表演讲,鼓励各界为国奋斗,服务桑梓,投身新四川建设。

蒋介石此行共19天,从日记看,观感相当复杂,他看到四川省经济建设与社会治安逐渐走上正轨,稍微心安:“对川财政治安与经济之处置如计施行,惟川政无人为可虑耳。”^⑦“成渝二警察局长之调换,在成都政治之威信又进一步,川政基础渐稳矣。”^⑧但更多地是深感忧虑,“川政尚无基础,预算尚未确定”,需要努力以求进步。^⑨或许对兼理省政已感到厌倦,蒋有诸多不满,他在5月9日离成都前对各厅处长表示:“此次到省所见所闻,无一事可比较满意者”,感叹“川省恶习之深,思之痛心。”^⑩他甚至认为“治川难于抗战”: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10月15日。

② 《蒋委员长改进川政,以三事勉全省同胞》,重庆《大公报》,1939年10月18日,第2版。

③ 《蒋委员长改进川政,以三事勉全省同胞》,重庆《大公报》,1939年10月18日,第2版。

④ 《四川省政一片朝气,蒋委员长每日至省府办公,与各厅长共研整进之策》,重庆《大公报》,1939年10月17日,第2版。

⑤ 黄自进、潘光哲编:《省克记》,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106页。

⑥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102页。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5月11日,“上星期反省录”。

⑧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4月30日,“上月反省录”。

⑨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4月27日,“上星期反省录”。

⑩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5月5日。

四川习俗环境太劣,政治复杂,顾忌太多,如何使之改革上进,思之痛苦!其艰难有甚于抗战也!①

三、治川方针的制定与施行

身处抗日战争胶着阶段,蒋介石更多地是关注整个战局,不可能以全部心力投入川政。事实上四川省的日常事务是交由秘书长贺国光处理的,蒋通过贺遥控四川。1939年10月7日,他首次到成都处理省政的次日写下“川政方针”10条:

甲、安定人心。乙、处理保安队维持秩序。丙、振刷纪纲。丁、信赏必罚。戊、保障人事。加紧工作。庚、改正生活。辛、投资生产。壬、官不啻商,不争官做,戒除贪污。癸、安置失业与政客,收容难童,优待童工。②

蒋介石的“治川方针”,内容庞杂,多数是一些具体措施。他的总体目标是清除地方主义,安定社会,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使四川成为抗战稳定的后方。蒋也清楚这个目标难以达到,故又提出“省政应将党政军统一指挥与分工合作,消极者以剿匪与禁烟为主,积极者以管教为主”。③ 蒋治理四川的方针与具体措施,体现在他参与制定的两个文件中。

1939年12月5日,蒋介石手订之《四川省施政纲要》颁布。这个代表他治川方针的施政纲要计9项28条,其中治安与剿匪4条、禁烟4条、吏治4条、地方自治2条、财政金融2条、地政1条、卫生3条、经济建设5条、教育3条。④

根据纲要,在治安与剿匪方面,整顿警政,加强训练,充实设备;把保安团队分配到各行政区,供专员县长灵活使用;一县之匪,由县长在3个月内负责肃清,县与县间之匪,由专员负责清剿,限6个月内完成。在禁烟方面,禁烟必须限期完成,禁烟收入不能用于禁烟设施以外其他用途;统一禁烟行政,提高禁烟行政效率;按时查明烟民实数,设立禁烟所;严惩贩毒吸毒者。在吏治方面,切实实行甄审训练实习任用考核暨奖惩等办法,提高县长权责及待遇。在地方自治方面,依照《县各级组织纲要》实行自治,鼓励党员从事地方自治工作。在财政方面,以不再增加人民负担为原则,确立省县预算,实行会计审计及公库制度,厘定税制,整理财务行政机构,改善纳税手续,限期1年内建成全省金融网。在地政方面,限期1年内完成土地陈报工作,5年内完成土地测量工作。在卫生方面,委托各大学研究本省出产药材,训练服务卫生事业人员,筹设边区行政医院。在经济建设方面,设立生产计划委员会,设厂自制本省必需品以期达到自给自足;扶助设立消费合作社,减轻低薪人员生活负担;设置四川兴业银行,以促进生产发展经济。在教育方面,整饬学风,充实学校设备;划定中等学区,改进质量;切实推行义务教育及民众教育,调高小学教师待遇。

贺国光在1940年元旦撰文指出,《四川省施政纲要》是“建设新四川,使四川成为中华民国复兴根据地之起码办法”。⑤ 省政府根据该纲要编订了1940年度施政计划,具体落实。

① 黄自进、潘光哲编:《困勉记》(下册),第412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10月7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10月15日。

④ 周开庆:《四川与对日抗战》,第138页。

⑤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1937年—1950年)》,第89页。

蒋介石 1940 年 4、5 月间第二次到成都时,重点关注经济建设。他与各级官员商讨后,核定了《四川省经济建设纲要》,确定经济建设的政策、机构与兴办实业项目。该纲要分为政策、组织、建设项目、经费 4 个方面,确定“发挥民生主义之精神,以增加物资之生产,谋人民全体幸福,兴利以惠民,非与民争利”的经济建设原则。在具体措施方面,筹备设置四川省经济建设委员会,作为经济建设的设计与推动的中心组织,拟定土地、农林、工矿、交通、贸易、金融、垦殖、卫生等八项为建设主干,分头并进。^①

各项政策措施确定后,蒋介石认真督促落实。

在禁烟方面。烟毒是“川省同胞刻骨切肤之大毒”,蒋介石将禁烟当成治川的重要任务,从他首次赴成都的日记看,禁烟是其考虑的重要工作内容。如提到“川康施政以禁烟、卫生与交通三者为重。”“速办戒烟院,限期普遍设立完成,令刘瑞恒来办。”“禁烟限明年二月完成,以减轻田赋为奖惩”等。^②为统一禁烟,他在 1939 年 12 月下令将川省肃清私存烟土督办公署、川康禁烟督察处、川东缉督办事处、民政厅禁烟科等一并裁撤,改组为“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③,蒋亲自兼任公署督办。他对提前完成禁绝任务的潼南、奉节、绵竹等县给予奖励,亲题“一县光明”匾额颁赐,以资鼓励。^④1940 年 3 月底,全川烟民戒瘾期限届满,多数县都已呈报全部戒绝。蒋介石对禁烟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这半年以来我们所努力的最光荣的第一件事,就是四川省禁烟成绩能够达到预定的目标。”^⑤

推行新县制方面。蒋介石要求四川要在实行新县制方面“树全国改革县政之先声”。蒋兼省主席期间,两次召开专员会议落实新县制工作,对“省县财政之划分、收支之规定、县预算之编制,省库补助之范围及其标准,以及区署乡镇各级人事之调整、教育工作之扩展、国民兵团及各级队之组织等”,都有详密的规定。^⑥为推进地方自治,蒋于 1940 年 4 月特别发电劝告川省乡绅出任乡镇保甲首长,服务地方。^⑦同年 5 月,四川省训练团特别开设地方行政干部训练班,以提高地方公务人员素质及地方行政机构效率。蒋介石特颁训词,要求学员“改革过去恶习,奋发革命精神,以备担当刷新地方行政推进地方自治的职责”。^⑧

整理财政方面。蒋介石兼理期间,四川的财政也逐步摆脱混乱的局面,省县财政划分走上正轨。蒋介石于 1940 年 7 月发表《告四川省同胞书》,就县市财政的收支划分、收入整理、支出整理、机构制度整理、流通金融发展经济增加人民富力等提出 5 项意见。蒋表示:“四川各县财政,若能加以彻底整理,政府收入,自可大量增加,人民负担,不但不会增加,反而可望减少。”^⑨四川财政厅长甘绩镛在总结抗战三年来四川财政与金融进步时称:“(川省)在抗战期中财政情形有着显著的进步,而其中的递嬗变化,与政府当局的坚苦奋斗情形,不但在川省财政史上占着重要的篇幅,便是

① 《川经济建设,蒋委员长核定纲要》,重庆《大公报》,1940 年 5 月 10 日,第 2 版;1940 年 5 月 11 日,第 2 版。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 年 10 月 12 日、10 月 13 日、10 月 15 日。

③ 《行政院会议提出报告,国府批准中苏商约,蒋委员长兼四川省禁烟督办,增设农林部、卫生部署直行政院》,重庆《大公报》,1940 年 1 月 24 日,第 3 版。

④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1937 年—1950 年)》,第 96 页。

⑤ 《川政建设之检讨,与今后应有之努力,蒋委员长在川省党部训词》,重庆《大公报》,1940 年 6 月 5 日,第 2 版。

⑥ 周开庆:《四川与对日抗战》,第 140 页。

⑦ 《蒋兼主席勸川省紳耆出任乡镇保甲首长服务地方,各县县长党部尤应虚心接纳》,重庆《大公报》,1940 年 4 月 30 日,第 3 版。

⑧ 《川地方行政干训班开学,蒋委员长训词》,重庆《大公报》,1940 年 5 月 10 日,第 4 版。

⑨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1937 年—1950 年)》,第 115 页。

在民族战争史上也含有重大的意义。”^①

1940年10月16日,贺国光代表蒋在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第三次大会上报告省政府的施政,从10个方面详谈近年来的政绩:第一,剿匪。四川省的大股匪患已经肃清,总清剿工作已经完成。在总清查方面,延迟到1940年底之前彻底完成。第二,禁烟。禁种方面,四川省内地已经根绝,但在省边区如雷马屏峨等处,深山峻岭不易查处,尚未彻底铲尽;禁售方面,已没有公开销售现象。第三,吏治。两次甄选县长,共甄选出合格县长117人,三次甄选佐治人员,共甄选出合格人员185人;甄选出的官员均经过训练,在省府特别设立人事科负责对官员的考核事宜。第四,征兵。省府考虑到原来的按照抽丁征兵办法对民众生活影响过大,提请中央在四川实行征保办法,并提高应征人员的待遇。第五,征工。改变过去流弊滋多的征工办法,不使人民赔累。第六,新县制。省府已经成功训练80%的乡镇长,最近就能全部完成,以奠定新县制的基础。第七,财政。省府已实行会计审计及公库制度,一切行政经费数目达到3000元的项目,都必须经审核后才能动用。第八,经济建设。对整个经济建设已有详尽计划,由于财力的限制,实施起来仍有很大困难。第九,教育。最重要的国民教育正在努力推广进行中,对质量不佳的状况正在设法改善。第十,粮食。已遵照中央命令成立粮食管理局,严禁囤积居奇,保证一般平民的水平,并特别设立军粮处。

贺国光也谈到施政的诸多不足方面,并强调环境上的困难:“迄今检讨,自然有许多未能付诸实践,但确系实际上有困难所致”。^②

这个报告可以说是蒋介石兼理期间政绩的自我总结。几乎在同时,中央通讯社也对蒋介石就任省主席一年来四川省的工作进行总结,共列出禁烟、剿匪、平定物价及管理粮食、改进兵役办法、设立甄委会整理吏治、举办干部训练班刷新基层机构、设立县市财政处整理财政、充实省银行调剂金融、实行公库制度、推广合作金库、扩大农贷、调整蚕丝办法增加蚕农收入、组织垦务委员会、组织防旱督导团、设立公路委员会、组织征工委员会、计划推进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待遇、改进中级学校质量、充实社会教育内容、配合战时教育需要、推进边区教育设施建设、提高教育行政效率、调整保安队编制、设立保安团队消费合作社等25项进步措施。有人评论道:“川省府一年来之重要设施,纯以新县制为鹄的,亦即蒋委员长兼理川政刷新川政之唯一设施。”^③

这些总结,固然有吹嘘与奉承的成分,但所列项目均非空穴来风。蒋介石兼理川主席,使得四川有了其他省所不具备的“优势”:蒋以全国的视角,从抗战大局出发制定治川政策,他的权威使各项政令贯彻推行时阻力稍小,他所拥有的有形与无形资源也有助于四川建设逐渐走上正轨。1940年10月13日,李肇甫(即李伯申,继贺国光之后担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在四川省临时参议会上发言中提到,蒋介石主持川政“已下良好种子,现正滋长,今后繁荣,端赖培养”。蒋手订之四川施政纲要,“早已奉为川省施政典则”。^④

蒋介石兼省主席本就是权宜之计,是特殊时期的一个过渡,找到合适的继任者才是长远之计。蒋属意的人选仍是张群,他兼理一年多,都在刻意为张群继任四川省主席做铺垫。

蒋介石帮助张群入川的重要步骤之一是设立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蒋在第二次赴蓉时,首次提出建设四川省经济建设委员会“以为推动研究设计及服务之中心组织”。1940年6月,行政院颁布《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组织规程》12条,将组织扩大为四川、西康两省,其成员为川康两省政府主

① 甘绩镛:《抗战三年来之四川财政与金融》,《经济汇报》1940年第1—2期,第77页。

②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1937年—1950年)》,第122—124页。

③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1937年—1950年)》,第121页。

④ 周开庆:《四川与对日抗战》,第146—147页。

席,经济、交通、农林、财政等部代表及两省建设、财政厅长等。^①9月27日,蒋介石决定自兼委员长,并指定张群、徐堪等10人为该会常务委员。^②11月1日,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在成都成立,蒋介石特意委托张群主持,由张代为陈述今后川康建设之重要方针,希望“政府与民众共同努力”,为川康两省“一般人民谋福利”。^③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政治上的影响,远大于其在经济上的意义。通过经济建设委员会,张群与四川各军政将领有了经济利益上的“互动”,彼此联系更加密切。四川军人看到蒋介石力推张群主川的决心,由之前的“拒张”转为“迎张”。

1940年11月13日,行政院第490次会议议决照准蒋介石辞去兼理省主席职,由张群继任,同时委派张为成都行辕主任。^④川省各界态度与两年前大不相同。成都商会及农工商士绅民众等“以张氏德望素孚,感极欢欣”,纷纷表示竭诚拥护。^⑤《大公报》认为,蒋介石兼任省主席本就不合国家体制,而张群来主川政,是中央重视四川的表现,四川人应协助张群。^⑥

张群顺利入川主政,使蒋介石得以放心地解职。他在11月的“反省录”中写道:“川省主席由张群继任,此为三年来不决之大问题,能获得如此顺利圆满解决,实如释重负。”^⑦在进行1940年全年工作总检讨时,蒋再次把张群入川作为第一大幸事:

四川省主席问题悬而未定,故抗战基础,尚未巩固。尤以川人好谣,时用忧虑,卒于十一月间岳军主川,得以顺利解决,不仅四川局部之幸事,而实为抗战全局成败所系之关键也。^⑧

四、蒋介石兼理川政的得与失

检讨蒋介石兼政四川一年多的得与失,应该从他兼任川主席的背景与目的两方面着手。

蒋介石是在委派中央官吏为四川地方实力派所拒,而四川实力派内部又矛盾重重的情况下,无奈自己兼任的,经过一年多的部署,他最终将职务移交给给自己属意的张群,虽然在时间上有所延迟。

蒋介石希望能将四川建设成稳固的抗战大后方。他对四川事务表现出较大的热情,对各项建设事业作了较详尽的规划,他还亲力亲为,督促清剿烟毒、整理县市财政、推动实行新县制等。他主政期间,四川的各项事业有了一些进步,为全国抗战事业做出了贡献。

然而,蒋介石兼理川政的时间只有一年多,许多工作只是刚起步。更何况蒋施政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他的一大败笔是在平抑粮价方面。

1940年粮食普遍歉收,加上日军劫掠等因素,四川出现粮荒,成都米价于2月开始飞涨。蒋介石密切关注,他认为“成都米价陡涨,确系奸商大贾囤积抬高居奇,诚堪痛恨”,命令各军政首长严加惩治。^⑨9月12日,蒋为实施粮食管理发表《告川民书》,严厉斥责投机倒把、倒卖粮食者推高

① 周开庆:《四川与对日抗战》,第144页。

② 周开庆:《四川与对日抗战》,第146页。

③ 《川康经建会成立典礼纪详,张群代蒋委员长主席》,重庆《大公报》,1940年11月7日,第3版。

④ 《行政院决议任张群谷正伦为川甘两省府主席,张群兼军委会委员长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任宪兵司令兼渝卫戍副司令》,《申报》,1940年11月14日,第3版。

⑤ 《张群主川,川人大欢迎,张氏定十八日就职》,重庆《大公报》,1940年11月15日,第2版。

⑥ 《短评:张群兼理川主席》,重庆《大公报》,1940年11月14日,第2版。

⑦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4册),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720—721页。

⑧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5册),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282—283页。

⑨ 周开庆:《四川与对日抗战》,第141页。

粮价：

这一次粮食市场如此畸形的现象发生在四川，实在是表现我们四川人们自私自利的缺点，表现了四川一部分同胞的不明大义，和没有现代国民爱国的常识，表现了四川政治的无组织无能力；我个人固深觉惭愧，同时也是我全川同胞在抗战史上一个最大的污点。^①

蒋要求川民遵行粮价法规，如有囤粮居奇或藏粮待价而不遵法令出售者，一定以“妨害民生，扰乱社会”论罪。然而，粮价飞涨的局面并没缓解。11月初，蒋介石专门约党政要员讨论粮食问题。他无力平抑粮价，就将所有的问题归罪于“四川军阀”：

四川军阀之无知自扰，与粮食之高涨不已，足使精神不安也。此种不生不死之环境与局势，令人郁闷无已。^②

蒋介石兼任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能加强对四川的控制，尤其是消除四川实力派的地方主义。刘湘病逝后，蒋介石认为是一个机会。不料，他控制川局的各项举措“操之过急”，遭到抵抗而不得不亲自披挂上阵。他兼理四川政务期间，对四川实力派采取恩威并施的方针，但在内心对川系军人始终是厌恶与敌视。在全民族抗战大背景下，四川地方实力派也有所收敛，政局渐显稳定。然而，这是治标不治本，蒋的各种努力，最终也未能消除四川地方实力派的离心倾向。抗战胜利后，川康军人与蒋渐行渐远，以此点而论，蒋介石并不成功，或者说，是失败的。

透过蒋介石处理四川省主席空缺的过程，或可窥探出蒋介石与四川地方实力派较量的态度与策略，即目标上坚持原则，但方法上却颇费心机，较为灵活柔性，甚至不惜妥协退让于一时。蒋坚持实现四川“中央化”的目标不变，刘湘死后，他拟派张群主持川政，遭到川系军人抵制后，遂改为选择川军中最“亲中央”的将领出任，再次受挫后，就自己亲自兼任，阻止四川地方实力派的企图，培植基础，待时机成熟，仍成功地达到了让张群主政四川的目标。观察他的处置过程，行事不果断，自己受累，效率低，且留有后患，但在当时情况下，却也是不失为一种减少动荡与阻力，付出成本较少的选择。蒋的这种风格，在其处理与其他地方实力派的关系时，也常常显现。

评论蒋介石兼任四川省主席的得失时，有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是其兼职过多、过滥。1939年，蒋介石已是国民党总裁、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最高国防会议主席。在四川，他除兼任省政府主席一职外，还兼着在成都的中央军校校长、四川禁烟督办公署督办、烟毒总检查督查团团长（1940年8月交由褚辅成代理）、省训练团团主任、省生产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因而，有人认为，蒋只是挂一个空名、“爱揽权不爱授权、独裁专权”^③，讥其为“兼职冠军”。

笔者认为，对蒋介石兼职过多过滥现象，还要具体分析。首先，前文已详述，蒋兼任四川省主席本非所愿，甚至觉得是“苦差”。他在1939年9月14日记道：“今日更无片刻之暇，而政客、官僚之无心肝，国难至此，尚以私利私见为重，尤可伤也。”^④9月25日更记道：

^① 《为实施粮食管理，蒋委员长告川民书，囤粮不售于情于理均不可恕，政府决彻底平抑人为之米荒》，重庆《大公报》，1940年9月12日，第2版。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1月7日。

^③ 陈仓：《兼职冠军蒋介石》，《杂文月刊》2008年第6期，第251—252页。

^④ 黄自进、潘光哲编：《困勉记》（下册），第680页。

对内对外,对老对少,对文对武,皆须以一身亲当,处境之苦,窃恐古今中外,未有如我今日之艰危也!至此不能不叹民族之衰老,与民智之幼稚,何能生存于此优胜劣败之世,呜呼!余之心力交瘁矣!^①

文字中难免夸张矫情,但实情大致如此。其次,蒋在四川省内的兼职,除中央军校校长一职外,均是相关规定的职责所在。张群继任省主席后,蒋将这些职务全都移交给张群。故若以兼理川政事为例来批评蒋喜欢“揽权”,似乎过于苛求。

当然,蒋介石兼任之后不能专注于省主席职守,遥控指挥,这本身就是“下策”,是其无法把握大局,不会培养与使用干部,执行力与处理危机能力不足所致,同时也与其狐疑寡断、揽功于己委过于人,遇事不能抓大放小,喜好亲历亲为的个性有关。作为例证,蒋兼任省主席期间,有时关注的事情也是无关省政宏旨的琐碎问题,如道路的整洁、城门的口号等。^② 蒋的这些失误,是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大忌,难免事倍功半,所有劳累,可谓咎由自取。

从更深层的层次上探究,此事还与落后国家的社会组织结构不健全不无关系。抗日战争是在经济军事方面较为落后的中国与较为先进的日本之间进行的一场全面战争,中国在军事、经济诸方面均逊于日本,只有建立“战时体制”集中权力来调动社会资源方能维持抵抗。批评蒋兼任是“下策”的徐永昌也表达了“同情”:蒋出此下策与其“燎急个性”有关,但最大原因是国家落后,“人才少不得助”。^③ 在这一点上,笔者认同黄仁宇的分析:

并不是蒋(介石)爱亲理庶政,而是中国社会尚未进化到现代的阶段,尤以大陆之内缺乏工商业组织,无完善之税收制度。……蒋缺乏适当之社会架构在后支持他的军事,因之他只能自己挺身而出代替组织制度之不足。^④

[作者陈红民,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罗树丽,杭州绿城育华学校教师]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25日。

② 如蒋介石的日记中记道:“(成都)城外马路应速修及华西路特重清洁。”(1939年10月5日)“成都沙土应用竹罗或麻袋装置,水桶应置小木勺便于提水。”(1939年10月17日)“城门标语:戒烟、防盗、救贫、识字、修路、保甲、合作者赏、高利贷者严罚。”(1940年4月24日)

③ 徐永昌:《徐永昌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189页。

④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347—348页。